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 一、苦难的童年

1905年6月13日，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在澳门下环街一个小渔村，一艘飘摇晃动的渔船上，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哇哇啼哭声——一个小生命降临于世。

冼老爹来到船屋，凑到婴儿身边，用粗大而长满厚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孙子。啊，微陷的双眼，略厚的嘴唇，还有鼻子都酷似喜泰，一想到半年前出海捕鱼被大海吞噬的儿子，老人悲从喜来，心像撕碎了一般，禁不住失声哭道：“可怜的孩子，生下来就没见过爹。”

刚生产完，有些虚弱的黄苏英更是悲喜交集，伤感不已，抽泣着说：“阿公，快别说了，给孩子取个名吧。”

老人拿着笛子走向船舱，边走边说：“他爹不在了，你就随便给取个名吧。”

黄苏英听着船头传来令人心碎的笛声，凝望着舱外，只见满天星斗，个个眨着眼睛，似乎能体察人间悲欢，懂得人世亲情似的。而茫茫的大海，翻着银光，海浪不时拍击着礁石，掀起层层波涛。

“啊公，就叫星海吧。”“这个名字好，咱们渔家穷透了，只有这无边的海和天上的星星是咱们渔家的。”

黄苏英温柔地把脸贴在小家伙的面颊上，深情地唤了一声“星海”。小家伙微微睁开眼睛，咧开小嘴，似乎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一代天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就这样翻开了他生命篇章的第一页。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祖上是以捕鱼为生的“水上人家”。当时广东渔民忌讳女人出海，认为“女人出海船底翻”。但冼老爹年迈，黄苏英是冼家顶梁柱，为了生存，她冲破封建迷信的枷锁，和爷爷一道出海。

每次打鱼，小星海就被妈妈用十字兜袋驮在背后，稍大一点，会走路了，妈妈又在他腰上系一条大带子，拴在船屋里。星海也很懂事，几岁时就帮妈妈拖网、洗船，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同其他渔家后生一样，小星海终日与大海为伴。最好的玩具，就是那些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贝壳、海螺、珊瑚、龙虾。

或许是遗传吧，小星海从小就迷恋吹笛和一些朴实的船工号子等音乐。那时，只要爷爷拿起大海螺，吹出“呜……呜”的声音，他就手舞足蹈，咯咯大笑，仿佛这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能给他带来无限的欢乐。

一次，小星海模仿爷爷，捧起一只小海螺，扬起脖子，喇叭口朝天，脸憋得通红，可发出的声音却是“扑……扑”的气声，急得他小腿一蹬，把海螺仍一边，伤心地哭了。后来一次次的实践，小星海慢慢地摸到了规律，找到了发音点，能吹得“呜——呜”地叫了，小星海高兴极了。

小星海还常常依偎在爷爷怀里，让爷爷教他吹笛。到5岁时，他也能用父亲的遗物——笛子，美滋滋地吹自编的调子了。

爷爷看小星海对笛子这么着迷，便满心欢喜地给星海做了一个小柳笛，教他吹《渔歌》、《渔家怨》等广东水乡民歌。此后，三尺竹箫成了他亲密的朋友，每天他都要吹几曲。

那时，捕鱼归来，每当爷孙俩吹起广东的《渔歌》等曲子，常常吸引很多渔民驻足倾听。笛声驱走了大家一天的疲劳，使人们忘却了忧愁与烦恼。

爷孙俩深受大家的喜爱，小星海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笛手。

妈妈黄苏英出身广东农村贫苦农民家庭，能识会写一点字，很会唱歌，从小就熟悉那些杠夫、轿夫、挑夫唱的劳动号子，一有空闲就教星海唱歌。“顶硬上，鬼叫你穷，铁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换世……”《顶硬上》，这顽强抗争的号子，鼓舞着他们与贫穷命运抗争。

一家三代，就这样相依相伴，风里来雨里去度过了7个春秋。

小星海7岁的时候，操劳了一辈子的爷爷终于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一贫如洗的冼家从棺材店赊来棺材，安葬了爷爷。料理完丧事，棺材店老板又来逼债。无奈，黄苏英只得以船相抵，领着小星海离开他们朝夕相处的水上船屋。

离开那天，星海依依不舍地走了几步，忽然叫道：“妈，您等我一会儿，”边说边撒腿往自家小船跑去。跑到船上，从舱顶上取下爷爷做的小柳笛，飞快回到妈妈身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妈，您别难过，我要把爷爷教给我的曲子一个一个吹给您听。”

“乖孩子，妈妈不难过。”望着懂事乖巧的儿子，黄苏英感到了一丝安慰。

妈妈领着小星海，沿着漫长的海岸，漫无目标慢慢地走着。傍晚，他们来到了澳门的繁华地区，华灯初上，五光十色。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却不是它的主人，倒是那些外国人趾高气昂穿梭往来，高鼻子洋人巡捕哇哇地大声训斥中国人。小星海不安地注视着这灯红酒绿的地方，看着星海迷惑不解的神情，妈妈说：“孩子你太小，长大就会明白。这不是我们穷人呆的地方。”但身无分文的母子俩又能上那儿去呢？

走投无路之际，新加坡移民局在澳门招华工，黄苏英怀着一线希望，领着小星海，搭乘专运华工的轮船，到新加坡谋生去了。

## 二、在新加坡结识黄大哥

到了新加坡，星海和妈妈并未结束那苦难的日子。

妈妈被介绍到一个布店老板家当佣工，母子二人住在主人家的门房里，星海每天也得帮着干些扫地、擦屋的小活，还得忍受肥胖女主人的白眼和监视。最让他感到不平的是妈妈天天接送小少爷去读书。

深秋的一天，他悄悄跟在妈妈后边。妈妈送了少爷转身回去，他却轻轻溜进了学校。上课铃一响，他顺着有歌声的教室走去，当他扒着窗口，正好奇地看老师教唱时。冷不丁被一只大手揪住衣领：“出去，这不是讨饭的地方！”

这恶狠狠的声音吓了星海一跳，而那刺耳的“讨饭”二字，更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委屈和污辱。他怒目瞪着这位工友，一转身向海边跑去。

毕竟是渔家后代，小星海与大海有着不解之缘，他把大海当做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不管高兴，还是痛苦，他都喜欢用小柳笛，对着大海吹上几曲。今天，他吹起了爷爷教的《渔家怨》，那委婉凄楚的曲调，是他心底的自然流露。而阵阵海浪，仿佛也在为这个不平的世界，不停息地狂怒。海风轻轻吹拂，抚慰着星海那受伤的心。

小星海忽然感到有人拍他的肩。想到在学校被赶出来的屈辱，难道他们追到这儿来，不让我得安宁？不要发怒，听到的却是亲切温和的声音：“小

朋友，你吹得很好啊，跟谁学的？”

小星海还在生气，埋着头不愿理睬。

“我常听你吹笛，但你并不快乐。”

“你怎么知道呢？”小星海气呼呼地反问道。

“你的笛声凄婉哀怨嘛！”那人仍和蔼地说。

“有六、七岁了吧，怎么不读书呢？”

小星海这才抬起头，注视着对方，只见中等个子，长方形脸厚厚嘴唇，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关切地望着自己，令人颇觉宽厚可信赖。小星海便将自己身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年轻人听说星海的苦难家境，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全靠母亲当佣人为生时，对星海充满了同情，沉吟一会儿便说：

“我也是广东人，刚来新加坡，我伯父在私塾教书，我帮你求求他，让你免费上学。”

听到能上学，小星海立刻兴奋得眼睛发光：“你真能让我读书？”

“当然是真是，我姓黄，你以后就叫我黄大哥吧。”

小星海也把名字和住址告诉了黄大哥，回转身，像怀揣着一头幸福的小鹿，兴冲冲地跑回了家。一进门便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正在洗衣服的妈妈。

一开始妈妈还半信半疑，小星海便拉着妈妈的手，把遇到黄大哥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通。听完，妈妈不由得叹了口气，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夜里，小星海睡得很甜、很香，黄苏英却激动的睡不着。连忙找出一块布，给星海一针一线地缝制了一个小书包，缝补了一件整洁的衣服。

第二天清晨，黄大哥来到门房，拉着小星海的手，送到了他伯父黄老师那儿。小星海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宿愿，和富家孩子一道坐到了课桌前。

到校没几天，小星海便惹老师生气了。

原来，他东家小少爷想用他的柳笛去做鱼漂，星海当然不愿意。女主人知道了，就破口大骂：“海鬼的儿子，把一个破竹管子当宝贝！”星海又气又恨，怕被抢走，便把笛子藏在身上。

不料，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发现了笛子，便央求星海吹一曲。拗不过大家的盛情，星海吹起了《顶硬上》。刚吹一半，老师闻声而来，认为他不专心读书，便拿走了笛子。

要知道，这笛子凝结着爷爷的心血，是爷爷留给他的传家宝，也是小星海欢乐的源泉、母亲的安慰与希望啊。小星海生怕被老师摔破了，放学后不敢回家，眼泪汪汪地坐在学堂的门槛上。

后来还是黄大哥了解情况后，替他去说情、解释，并建议伯父按照孩子们的意愿，开设唱歌课，以前黄先生总认为唱歌是音乐教坊的事，但经不住侄子的一再恳求同意了。

小星海高兴极了，取回了笛子，而且还能每天学唱一次诗经了。他更加在心底崇敬黄大哥，觉得遇到了黄大哥，就像在黑暗中有了指路明灯，可以勇往向前了。由此，也更加勤奋学习了。

当然，小星海当时不可能知道，黄大哥的确是一位为穷人指路的革命者，他原本是广州的小学老师，同盟会的骨干成员，辛亥革命时参加了新军，但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后，却将有些革命者扣上“会匪”的罪名而残酷杀害，黄大哥为了躲避风险才到新加坡的。

黄苏英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让星海读了4年私塾后，又转到一家英语学校学了1年英文。接着又在林耀翔校长的帮助下，进入岭南大

学新加坡分校——养正中学读高小。

在养正中学学习时，星海一直名列前茅。而且他随身带着柳笛，一有空，便吹几曲。持之以恒的勤奋练习，使它吹箫技术长进很快，深得师生的赞扬。

学校礼堂有一架钢琴，它时时刻刻吸引着星海，只要听到琴声，他便飞奔而去，伫立在钢琴旁久久不愿离开。常常用羡慕的眼光恳求老师“再弹一遍，再弹一遍吧”。

一次，趁着没人，星海悄悄揭开了琴盖，小心翼翼地按了几下，好像怕碰坏了琴键似的。老师来了看到他爱不释手的样子，明白这是一位喜爱音乐的学生，便主动教星海弹琴。星海兴奋地敲着琴键，听到由自己的手发出或低沉、或尖锐或铿锵的声音时，如同畅游在音乐的大海自由自在。

从此，一放学星海便到小礼堂练一会儿钢琴，逐步学会了钢琴简单指法，还可弹几首进行曲了。

两年的高小学习结束了，星海已 14 岁。长成了一个身材细长的青少年了。从历史课学习中，他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知道了辛亥革命推翻前清皇帝的伟大业绩，不愿再呆在新加坡过漂泊流离的生活，渴望早日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和母亲商议后，他们决定立即启程回国。

### 三、岭南大学的才子

1918 年秋，星海和母亲回到了祖国。带着林耀翔老师的推荐信，找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

钟校长看到星海功课门门皆优，而且多才多艺，会吹笛子弹琴，十分欣喜，安排星海先到华侨学校特别班补习国文、算术和书法等课程，又让黄苏英在岭南大学当洗衣工，母子二人住在校园对岸的一个茅草棚里。

岭南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官宦富家的子弟，他们穿的是西装，吃的是西餐，平时交谈也用英语，洋化十足，质朴、刚毅的星海在这种腐化的环境里始终不卑不亢，保持着对人生、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中学期间，星海家贫，便半工半读。他兴趣广泛，喜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岭南大学有一个青年会，是多种活动的中心，分设经济、庶务、交际、童工等各部。1921 年至 1923 年星海担任了童工委办，每逢周末，星海与出身农家的同学都去附近的邻村教村童们游戏及唱歌，教农民和工人识字，也潜心搜集一些村子里的童谣、山歌。

那些纨绔子弟仗势欺人，故作清高，瞧不起贫苦的半工半读学生。一个绰号叫“猴仔”的南洋巨商的儿子，他为星海编了一个顺口溜：“半工半读两栖类，自告奋勇活受罪，为了一顿‘招牌饭’，跑断两条‘腊肠’腿。”“腊肠”是他们嘲讽星海，为他取的绰号。当时正处发育期的星海身体长得很快，使得刚穿上不久的裤子就变短变窄，两条裤管紧紧裹在肌肉结实的腿上，还真像“腊肠”。

好朋友们为星海抱不平，星海却若无其事，不与他们计较，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星海对音乐有着无限的热爱和毅力，一进入充满浓郁音乐气氛的岭南大学，便如鱼得水。当时，学校的歌诗班，常常放配上了赞美诗的外国歌曲和著名音乐家的外国古曲音乐。它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下子印入了星海的

脑海，又如一股甘美的泉水，灌进了星海的心田，开阔了星海的音乐视野。歌诗班的活动，常常能见到星海活跃的身影。

岭大的校管乐队是 20 年代中国最早的一个音乐组织，在华南享有很高声誉。乐队有短笛、单簧管，中、小号等 30 多种乐器，并专门聘请了指挥，为爱好音乐的本科和附中学生训练辅导。星海升入附中不久，便以出众的吹箫技巧而加入了管乐队。他爱上了抒情柔和的单簧管，自己琢磨，摸索音阶，废寝忘食的苦练，很快掌握了吹奏技巧。1922 年，应邀为岭大附小交际会表演单簧管独奏，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的单簧管独奏成为岭大晚会的必演节目，星海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南国箫手”。

当时学校里提琴多，星海便又抽空学提琴。常常在他的小屋里咿咿嗡嗡拉个不停。那全身心，忘我投入的情形吸引每位路过之人。深夜，为不影响同学，他装上弱音器练琴，那袅袅的琴声，像从石缝里挤出来的不屈的劲草，拼命往外伸展，使四邻的同学，伴着悠扬的小夜曲进入美妙的梦乡。

星海多才多艺，还颇富美术才华。1923 年，他任《惺社诗刊》的美术主任，设计封面。他还喜欢研究书法，写了 7000 余字的《中国书学略谈》，刊登在《惺社诗刊》上。

这时，星海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小画家司徒乔。司徒乔比星海大 2 岁，他俩都是工读生，又是同乡，两家母亲亲如姐妹，最关键的是他俩都酷爱艺术。那时，常常能见他俩结伴而行，一个在珠江边支上画夹画浮屋，一个在小山丘上鼓起腮帮吹奏竹箫、单簧管；或是司徒乔在屋中画画，星海则在一旁拉小提琴“陪伴”。

1924 年，星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岭南大学，他仍然钟爱音乐，依旧活跃于校业余管乐队和校银乐队。

1925 年，星海被聘为校银乐队指挥。此后，在开学典礼、交际会、联欢会、毕业典礼，迎来送往时，都能在高敞的礼拜堂，看到星海那高高的身子站在讲台前，双手强有力地、活跃地挥舞着指挥棒，那不同高低音乐波浪伴随着他手中的指挥棒，有节奏地起伏。40 多人的乐队在他的训练下，节奏感、音乐感和表现力都颇有提高。

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岭南大学上上下下都荡漾着一片春风，星海更是异常兴奋，神采飞扬。他挤进游行的人群，随着队伍往前走。忽然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大吃一惊，转身一看，面前站立着一个英俊而魁伟的革命军人。这么面熟：“黄大哥，是您呀！”与自己的恩人不期而遇，让星海喜出望外。

星海急切地把自己近几年的悲欢大事，扼要说了一遍。听到星海想在音乐上有长足进步时，黄大哥说：“你的想法很好，祖国确实需要大量的音乐人才。北大的音乐传习所，质量高，颇有名望，你不妨去试一试。若实现了理想，要多做些向民众普及音乐的工作。中国百废待兴，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会与你保持联系的。”

黄大哥追赶队伍去了。星海停立在原地，仿佛做了一个梦，又忽然醒悟，觉得明白了什么，一个清晰的念头占据了脑海，那便是北上求学，积蓄力量，报效祖国。

当晚星海便把遇到黄大哥和决定北上学音乐的事，告诉了母亲。尽管母亲舍不得与儿子远别，但为了儿子的前途，母亲仍积极支持星海的选择。

次日，星海卖掉了小提琴，买了车票，匆匆到校长室办理了退学和辞职

手续，告别了慈母，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 四、北上求学 转辗上海

1926年8月，骄阳似火，星海背着行李，来到了北平（今天的北京）的北大音乐传习所。

当日便幸运地遇到了传习所主持人肖友梅博士。肖先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德国留学8年，1920年回国后一直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肖先生颇具慧眼，一见冼星海，便认定这是一个颇具音乐天赋的学生。虽然年龄大了一些，但只要刻苦学习，是能成才的。

果然不出所料，星海顺利通过考试，成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提琴和作曲理论。

肖先生很爱惜人才，得知星海家境贫寒，便安排星海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星海一切为了学习音乐，节衣缩食，靠着打工的微薄收入，在较外师从一位外籍钢琴教师，但好不景不长，没过多久，便因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而告终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进行大屠杀，为消除“共党”书刊和“国共合作”及“革命”字样的一切书籍，他们查封了北大图书馆。冼星海便失业了。

此时，星海接到母亲的来信，告之黄大哥也被杀。星海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黄大哥对自己的真诚帮助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这么善良正直、古道热肠、血气方刚的青年却不幸惨遭杀害，星海义愤填膺：“为什么总是正直、爱国的善良人士惨遭杀戮呢？”

不久，更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在北京执政的奉系军阀的政客刘哲认为“音乐有伤社会风化”，下令解散北大音乐传习所。很多同学被迫改行，星海更加百思不得其解。“取消音乐，难道想叫中国世世代代没有音乐文化吗？”

星海思绪万千，他忘不了依偎在爷爷怀里学笛子的情景，也挥不去眼下军阀混战、满目疮痍的惨象。凝望星空，他暗自在心底发誓：祖国，我一定要克服万重困难，坚持不懈地勤奋学习，为在全中国普及音乐，使中华民族人人能歌善舞，个个安居乐业，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奋斗不止。

得知肖友梅博士要在上海成立“上海国立音乐院”，星海便直赴上海。

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口试，星海在琴试中又以一曲《渔家怨》倾倒了考官们。星海得以主修小提琴，选修副课钢琴，并学习音乐理论，开始了他再次的专业学习。

为了筹措学杂费，星海又担任学校文书，再一次半工半读。为了让星海安心学习，母亲主动来到上海，给别人当姨娘（保姆），以维持母子俩的生计。

打这以后，星海更是惜时如金。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事音乐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要一生不忘去经历许多次苦恼和失败……做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吃普通人不能吃的苦，做一个贝多芬式的音乐家。”

此时，星海和同学张曙参加了进步的戏剧界组织“南国电影剧社”的活动，并由此结识了许多戏曲艺人，学习了不少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借机吸吮着民族音乐的丰富“营养”。最令他高兴的是，他认识了人称“田老大”的田汉先生。他十分敬重和佩服田汉的思想和才艺，排练了田汉创作的反对

封建礼教的进步话剧《湖上的悲剧》，担任了田汉编剧的话剧《南归》的小提琴伴奏。南国社成了星海的校外课堂和音乐实习的舞台。

不料，学校训育主任知道星海他们参加“南国社”后大发雷霆，训斥星海“学音乐的人是高尚、纯洁的，不同于戏子，歌郎，学校是培养与凡夫俗子不同的天才”。

星海压住心中怒火听完训话，仍不能理解学校为何要反对学生与民间艺人接触，他把此疑问写进了《普遍的音乐》一文，他认为音乐并非贵族私人的，没有全国普及的音乐，就难以产生音乐大天才。1929年学校院刊发表该文，这更惹恼了训育主任。他怕这带民主倾向的文章，给闹学潮学生以推波助澜的作用，又怕波及影响自己的“宝座”，从此更加变本加厉整治学生。

不久学校规定向每个暑假留校住宿的学生收额外练琴费和住宿费。

这个规定实在太荒唐。谁都知道，暑期不能回家的学生，皆是一无路费、二无钢琴的穷人，哪来这么多钱呢？

学生们议论纷纷，星海思索良久说道：“我们连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了，不去请愿，等待何时？”学生们一致推选张曙和另一同学去南京教育部请愿，让星海带领同学坚守宿舍。

不几天，去请愿的张曙被扣上带头闹学潮的“共产党嫌疑”的帽子而抓走，星海等12名学生也被扣以“以带头拒缴暑假练琴费和住宿费，煽动学潮，破坏院规”的罪名而开除学籍，强行驱出了校门。

同学们愤愤不平，含泪惋惜。星海也心如乱麻，十分痛苦。学业夭折，他感到辜负了慈母的恩情和重望。沉吟后星海真切地对同学们说：“希望大家成功地学下去，祖国是需要音乐人才和音乐的普及的。”

星海蒙冤受辱，失去音乐深造的机会，他的心在流血。24岁的星海为这人生的坎坷、无情和不公而愤懑。偌大的世界，难道就不能容纳我这个渔家后代吗？他四处奔走求友，倾述理想。未了，在田汉和洪深的帮助下，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报考世界著名的巴黎音乐院。

为筹集昂贵的路费，星海又跑细了腿。一个无权无势的渔民后代，却要到国外深造，自然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后来“南国社”的朋友帮他想办法，在一同乡的帮助下，乘上了西去的客轮。

## 五、在巴黎颠沛流离

1928年冬，星海藏身于一艘外轮的底舱水手房，离开了祖国。几经周折，次年春到达了巴黎。

一到巴黎，星海就按照从司徒乔母亲处抄来的地址寻找，满心指望于这位早年的亲密挚友能再次和衷共济，共度患难，不料女房东却告诉星海，司徒乔迫于经济，无法在巴黎学习绘画，在另一好友的帮助下，坐船前往纽约了。它乡求故知帮助的美梦化作了泡影，从此星海加入了饥饿队伍，成为悲惨的一员，流浪巴黎街头。

星海好不容易在一家餐馆找到了洗涮餐具的活儿以换取剩菜和面包皮充饥。不久，一位好心的东北老乡张大哥帮他谋了份餐馆跑堂的活。

每天，星海像“急行军”般穿梭往来端饭送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累得不能动弹。但这样下来，一日三餐有了保证，几个月后还攒钱买了把小提琴。

此后，星海忙里偷闲，利用送菜送饭的间隙，在厨房一角练琴作曲，把



琴放在碗柜上。一天，电铃坏了，星海当然听不见叫他送菜的铃声了，还在那儿用心拉琴。老板娘冲进来，气呼呼地说：“你不好好干活，却在这儿学琴，你都24岁了。哼，别做梦了，你是那块料吗？我那儿子4岁就练琴，练了十几年也不怎么样。我现在一听到琴声，就像听炸弹一样刺耳，想拉琴，就别在这儿干了！”

星海为了糊口，忍气吞声，不久，便租了一间最便宜的“蜜蜂窝楼房”。他住在楼顶拐角的一间小屋里。房间从外面看上去，好像一个鸟笼挂在空中，房高只有一个成人的高度，勉强能放一张小床和一张二尺见方的小桌。为了勉励自己克服艰难困苦，发愤学习，当晚星海便在床头写下了两行毛笔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

星海房间里有一个可以透气的伸向天空的玻璃窗。每天深夜拖着一双铅般沉重的双腿回来，打开天窗，站在桌子上，上半身伸出屋顶，伸向天空，对着上帝练琴。当然，为了避免房东达斯夫人的抗议，每次还必须在小提琴上加上弱音器。

有一天，星海忘情地练琴，不觉时光飞转，直到天明，一宿未睡，便直奔餐馆上工。正巧那天客人特别多，星海来回奔波送菜送饭，忙碌了一天，快收工时，忽然连人带盘一齐摔倒在地。老板娘不仅不过问星海的痛楚，反而气急败坏地说：“真在顾客面前丢人现眼，小广东你另谋高就吧。”

星海失去了糊口的工作，为了生存和练琴，不得不沿街再找点零活干，他先后给人喂牛养鸡，看管小孩，守电话，洗餐具，后来才在一个洗澡堂当杂役工。

这间洗澡堂正巧离马德里街的巴黎音乐院很近。工作之余，星海常常到这一世界著名的音乐学府去聆听学院的音乐。

一个初夏的下午，在学院门口，星海忽然见到一位东方人走出校门，他赶忙迎上前用中国话问道：“请问你是中国人吗？”当知道对方即是广东人马思聪，中国第一个考进巴黎音乐院高级小提琴班的留学生时，星海兴奋地向马思聪讲述了自己来法国求学的志愿和遭遇。

马思聪为星海吃苦耐劳、坚定的精神所感动和敬佩，便让星海第二天傍晚带着琴，把他引荐给了自己的老师——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一开始的测试，这位老师对星海并不十分满意，但同样被星海学习音乐的坚毅态度和无限热情所感动，便收他做了免费的学生。

星海有了著名音乐家作小提琴导师，仿佛久旱的禾苗，逢得了甘露，疲惫削瘦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走起路来也精神多了。不幸的是，他再次失业了。为了交房租和生计，他不得不屈尊到咖啡馆、酒店，为顾客拉琴，以换取几个法郎。

一天，星海在一家咖啡馆里演奏小提琴。奏完一曲，他拿着空盘，向各个餐桌讨钱，有人给钱，他礼貌地说声“谢谢”。当他走到另一餐桌时，只见两男两女，四个东方人，其中一个打扮入时的女郎，对着走来的星海，直捂着鼻子，另一只手不断拂动着手帕：“离我远点，臭要钱的。”另一个男青年却说：“你是哪国人，你给我们拉一曲正流行的《宝贝》，我把这一大把钞票都给你。”

星海明白了，这是一批白天逛马路，晚上泡在咖啡店消磨时光，却能享受奖学金的中国官派留学生。“我是中国人。”星海从容而温和地答道，“我不会拉那种下流的黄色曲子。”

“妈的，你到巴黎来要饭，还装清高，你给中国人丢脸。”那个男青年恶狠狠地说着，上前猛地扇了星海一记耳光。

星海那虚弱的身体被打得直晃悠，心狂跳着，面对这几位“祖国代表”，深感人世间的的天平。他们这些幸运的官派生，靠着家里的权势，同时领着两三份官费：向学校所在省里、自己的原籍省份、有的还从父亲工作的省里各领一份。此时此刻自己来巴黎后的饥寒、受辱、苦辣辛酸，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星海愤怒的眼睛射出火辣辣的光，定定地瞪着他们，冷冷地说：

“是谁给中国人丢脸？我用我自己的艺术换取生存的条件，总比享受着助学金却无端消磨青春的人高尚。你们在国内仗势骄横，到国外仍本性不改。请记住，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演出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丑剧，这才叫给中国人丢脸。”

星海慷慨激昂的一席话，令那几个家伙张口结舌，如同木雕一般。

星海说完转过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咖啡馆。回到自己的小阁屋，星海的心仍在流血，满腹的怨恨和耻辱涌上心头，他禁不住失声痛哭：“祖国啊，难道就靠这帮吃着助学金、泡在咖啡馆的人来振兴吗？”最后，星海告诫自己：“星海，为了学音乐，千万不能饿死和退缩，一定要挺住！”

奥别多菲尔老师了解星海的生活窘况后，送给星海一件大衣和一套旧西装，勉励他说：“一个人有才能、有毅力，就有条件得到成功，一个音乐家不是单靠金钱能培养出来的，你要继续努力。”并给他介绍了几位著名的卓越的老师。他们都爱惜这个穷困的天才学生，免收学费，悉心指导。

尽管免了学费，星海却仍难免饥饿。后来的一年多里，他仍靠做些杂役、出卖体力来维系生存。

## 六、考上巴黎音乐院

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北风怒号，星海冒着严寒在天窗外练完小提琴。没有棉被，便将破大衣裹了裹，倒在床上，想在睡梦中躲过这现实的不幸与痛苦。然而，凛冽的寒风一阵又一阵地吹来，把“鸟笼”的破门窗吹得嘎嘎作响，星海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冷寂的荒野，又好像整个人掉在了冰窟窿里。

星海又用平常御寒的绝招，起身走出鸟笼，快步走下7楼，迎着扑面的冷风，在马路上来回奔跑，再气喘吁吁的折回住地。想点着煤油灯，可那无情的寒风，仍旧像魔鬼争穴似的，以千孔百洞挤进来，一次又一次把灯熄灭。

冷酷的风让星海无以成眠，也勾起了星海对往事的追忆：父亲被吞没在暴风骤雨的恶浪里；沙门岛破茅房，他与母亲相依相伴度过了无数风雨之夜；在萧瑟的秋风中，他被迫离开了上海音乐院；上海码头工人，在呼啸的狂风中拖着沉重的步子……

“叭”地一声，瓦片吹掉在晒台上，摔个粉碎，霎那间，门缝的吱吱声，残叶的簌簌声，晒台的叭叭声，天窗缝的嗖嗖声，风沙扑门的沙沙声，电杆上的嘶嘶声，搅和在一起，这凄厉、混杂的风声中，也夹杂着穷苦凄凉的呻吟声。的确哪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不在寒风中挣扎？我要为穷人控拆这不尽的苦难和无尽的痛苦，诅咒这暴烈、冷酷、残忍的风。

想到这里，他忙把所有的衣服、毯子、被单全部堵塞四周的缝隙，然后点燃了油灯，摊开总谱纸，借风抒怀，一气呵成地谱出了一串串音符，在黎明前凝成了一首悲愤而生动的旋律。

清晨，亢奋的星海毫无睡意，他拿着来巴黎的第一首作品《风》，直奔奥别多菲尔老师处。

奥别多菲尔听了星海的试奏，极为欣赏，称赞说：“这是一部达到相当水平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东方民族色彩。我相信巴黎音乐家一定会赏识她。”他祝贺星海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并托加隆教授引荐，让《风》参加了巴黎音乐院新作品演奏会。这在巴黎音乐院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中国人写的音乐作品登上了世界音乐学府的舞台，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巴黎上下一片盛赞。最令星海高兴的是，《风》赢得了世界著名三大音乐家之一的杜卡斯教授的首肯。他夸赞说，由此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中国音乐青年，希望星海修改此作品以作验交作品，以此报考他的作曲班。

离考试只有几个月了。老师和朋友们都给予星海巨大的帮助和鼓励，音乐学院的女研究生袒尼丝小姐主动教星海学法文并担任伴奏。奥别多菲尔为星海找书籍、借乐谱，杜卡斯指导星海学习《赋格》、《作曲法》。星海也遵照老师建议，辞去一切工作，专心温课。星海信心百倍地准备同世界各大洲的青年争个高低，决心以自己的成绩来证明中国青年的志气和才华。

考试这天，星海穿着借来的长大旧西服应考，差点被门卫当作抬钢琴的而拒之门外。但笔试成绩优良，小提琴考试获最高分，还有作品《风》，这一切使得星海名列第三名，人们不得不对这个东方小伙子竖起大拇指，刮目相看了。

星海被请进了院长室。“祝贺你，可爱的东方小伙子。你已被正式录取到我们巴黎音乐院的作曲班。由于你以优异成绩荣列前三名，我们决定按惯例给你颁发荣誉奖，你现在有权选择奖品，你最需要什么？银杯、乐器、服装、名画……”

星海一开始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不，我都不想要，尊敬的院长。”

“那么，你想要什么呢？可爱的小伙子？”

星海不知所措，过了半晌，才羞涩地说：“我只想要饭票。”

院长哈哈大笑，不解地望着星海。

“尊敬的院长，请别见笑。我需要的最高奖赏，就是免于饥饿。”星海苦笑着说。

当天星海获得了一大叠饭票，并被通知，巴黎音乐院免费供应他的膳食。

1931年，洗星海这位历尽磨难的中国青年，终于在世界音乐中心找到了归宿，他正式进入巴黎音乐院学习，成为了音乐大师杜卡斯的学生。这是许多法国留学生和各国青年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同时还跟指挥班的拉卑教授学指挥，向国民乐派多隆母教授学音乐理论。他像草原上的小羊，拚命啃嚼着营养的草料。

星海虽可以不用为吃饭发愁了，但他仍是最穷的学生，那昂贵的学杂费、音乐会入场券还有房租，常常令他感到苦恼。

当时，按国民党政府规定：成绩优秀的自费生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官费津贴。按星海的成绩完全有资格享受官费津贴。为此，他多次去里昂找中法大学，那些中国官僚一听说他获得了巴黎音乐院荣誉奖，先还煞有介事派人到音乐学院核查，可慢慢便查无音讯了。星海又带着巴黎市长赫里欧所写的亲笔证明，去大使馆找有关官员，但仍然没有着落。星海终于明白了，只要你有权有势，那些官僚便主动把官费送上门，让你舒舒服服镀金，若你是无

依无靠的穷学生，成绩再好也无用。从此他对国民党当局不抱幻想了。

在学习期间，星海一开始找了份为一位音乐家抄谱的活儿，后因那人也长期失业，星海无谱可抄了，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了困境。袒尼丝小姐知道星海的苦处后，为星海介绍了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修女。她们经济富裕，非常喜欢音乐，喜欢东方的民族风情。她们为星海腾出一间小房子，让星海免费住下，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善待星海，每天还为星海准备好极富营养的膳食。每次饭后，听星海拉几段小提琴曲，并同他谈一些中国的风土人情。

杜卡斯也不断鼓励星海，要学会用心创造你独特的艺术风格，表现中国民族的个性。

不料就在星海写完毕业作品《游子吟》和《沙乐邦曲》舞曲以后，1935年5月17日，星海的良师益友，著名音乐家杜卡斯患心脏病逝世。

可以告慰老师的是，星海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完成了学业。1935年初夏，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院作曲班。

星海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杜卡斯先生墓前，思索着自己的去向。按老师的遗愿留在巴黎，找一份理想工作并不难。也许这样展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条铺满鲜花和金钱的平坦的幸福大道，很多老师和朋友也是这种想法，他们竭力挽留星海在巴黎从事音乐研究工作。

可是一想到祖国，又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星海的心坎上。要知道眼下祖国到处是饥饿和贫困。他想起了在巴黎看过的纪录片《日本占领支那东北三省》、《黄河水患》那一幕幕触目惊心、令人心酸的场面，那受凌辱的、痛不欲生的同胞。他们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饱尝了思念祖国、思念母亲的痛苦，星海决定启程回国，把自己的音乐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的祖国，贡献给中华民族神圣的解放事业。

当星海把这个决定告诉给袒尼丝小姐母女俩时，袒尼丝小姐却对星海说：

“你们中国正在面临灾难，你应该加入法国国籍。如果你想母亲，可以把她接来。”

星海却说：“中国有句老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现在不能留在法国。”

袒尼丝小姐无法说服星海，她们母女俩依依不舍地凝望着这个能吃苦的东方小伙子，由衷地祝福他未来平安幸福。

星海在回国前，把自己的优秀习作《萨拉班德》舞曲，赠送给了奥别多菲尔以作永久纪念。奥别多菲尔特意邀请了几个著名音乐家，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家庭音乐会，为星海送行。

末了，他挽着星海的胳膊，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回国以后，运用你学到的欧洲音乐技巧和理论，去努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音乐，让古老的中华民族音乐在世界乐台上大放异彩！”

带着恩师的教诲，星海卖掉了所有衣物，只带着一把小提琴、一件奥别多菲尔老师赠送的冬大衣，还有厚厚的乐谱，启程前往伦敦，再托朋友帮忙免费搭乘货轮，转道回国。

1935年仲夏，星海回到了上海。星海走时两手空空，归来依旧是空空两手，但他却带回了祖国最需要的精神财富——对祖国的爱和音乐。

## 七、挟琴归国的音乐家

1935年盛夏，冼星海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在上海打浦桥畔一个破旧的亭子里，见到了离别6年的妈妈。

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满头的白发，星海感到一阵阵的难受和惭愧，母亲这些年一直都给人洗衣度日。星海握着妈妈那双粗皮硬茧的手，心疼地说：“妈，等我找到工作，就不再让您受苦、受委屈了。”

星海没有想到，尽管他一踏上外滩，这消息便经报刊登载，在上海传开了。但偌大的上海竟没有接收他的单位，连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还得依靠母亲再次给人家做女佣而维持。

本来，星海一回来，就惦记着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希望把他的作品介绍给听众，向祖国人民汇报他在国外学习的成果。但他跑遍了整个上海滩，仍无济于事，连自己的母校上海音专钢琴系都婉言拒绝。

后来，星海只好带着一封巴黎音乐院老师的推荐信，到上海工部局乐队，这是一个由外国人组织的交响乐队，找到那位意大利指挥。该指挥碍于杜卡斯的名望，同意在向观众介绍贝多芬的作品的音乐会上，同时介绍星海的作品。

当星海按约定指挥排练时，又遭到个别外国笛手的故意捣乱。意大利指挥也趁势出言不逊，露出了歧视中国音乐家的真面目。

空有卓越的音乐才能，作品无法与观众见面。尽管星海也相信音乐家的生命和事业不在于一次表演，可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星海有些失落和愤懑。在家里临时招收了几个小学生教授小提琴，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此外他每天练唱法文歌，练习巴赫作品和自己的作品。

1935年秋，星海早年的南国社朋友，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戏剧家田汉前来看望星海。

田汉带来了南国社朋友们的消息，并告诉说自日本占领东北以来，大家已不再对国民党政权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星海也深有感触地说：“回国几个月，生活无着，作品无法演出。我也看透了国民党政府，我不再只‘为艺术而艺术’，终日沉湎于国际音乐家的幻想之中了。前几天，张曙也来信提醒我：大敌当前，要选择最好的方式，运用最有力的武器，去奋力挽救祖国的危亡。”

听到这儿，田汉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希望你像聂耳那样，写出更多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斗志的战歌……”

田汉的亲切勉励，给星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星海和南国社的朋友经常交往，并应邀跟随南国社的朋友们到南京出席群众歌咏大会。

在南京，他们深入体察劳动人民的生活，倾听被压迫人民的呼声。演唱会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和《码头工人歌》等，其内容和演唱情绪，都深深感动了星海，他感到自己的脉搏正与这些歌曲旋律同时跳动。下决心像聂耳等学习，暂不创作大型作品，专学救亡歌曲，用自己的音乐去抒发被压迫人民的心声，为被侵略的祖国服务。

返回上海后，星海在田汉和张曙的引荐下，结识了吕骥、任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参加了由他们发起组织的“歌曲作者协会”，一起探索和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工农音乐。

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宣传部，突然煞有介事地关心星海的前途了。

一位宣传部的官员，来到星海家，声称宣传部决定聘请星海前往南京宣

传部工作。

“我一个搞音乐的，去那里干不了什么！”星海说。

“先生可以为党国写歌谱曲，譬如说谱写《军歌》啊，还可以写蒋委员长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歌，而且待遇从优。”那官员边说边递上宣传部的聘书。

“收起你的聘书，我不应聘。”星海斩钉截铁地回答。

“冼先生你何必这么固执呢！常言道，识实务者为俊杰。还是应该三思而行啊。”

“我既不会写颂歌，也不会粉饰太平的歌曲，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星海断然地说，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国民党的高薪收买。

这位官员，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星海到百代公司当了音乐编辑，逐步摆脱了失业的凄苦，开始有了微薄的经济收入。此后，星海更加勇敢地投入了群众斗争生活。

不久，星海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工人运动会歌》。星海在创作中，进行大胆尝试，借助广东民歌的特点，使之充满青春活力，唱出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烈愤慨。歌中唱到：

九月里，好天气，  
风吹着运动旗，  
日晒着黑脸皮。  
这年头，  
强的做大哥，  
弱的受人欺，

……

随着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上海的大中学生上街举行宣传抗日和示威游行，他们要星海写一首四乐句的短歌：

一二三，我们的心是战鼓；  
一二三，我们的喉是军号；  
一二三，我们挥舞起刀枪。  
踏上抗战的血路，  
我们不怕敌人疯狂，

……

华北危急，撕裂着星海的心。深夜，他伏在小桌上，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抗敌的部队一道前进，渐渐地，一曲鼓舞士兵前进的旋律印入他脑海，他一鼓作气地谱出了这首《战歌》。

天一亮，星海将《战歌》交给了百代公司音乐部的负责人。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尝试着把《运动会歌》和《战歌》灌成唱片，出乎老板意料，两部唱片一投放市场，便像长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全国各地，打破了百代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

这下星海走红了，连老板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星海自己更是乐滋滋的，他认定走聂耳之路，利用唱片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作家的良心，这条路走对了。

可不曾料到，没过几天，百代公司老板又告诉星海，《战歌》被政府查收。他不能因出救亡唱片而参与政治，让星海出一批流行的、带点醉意的歌曲。

星海一听，明白老板是想用工资来收买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便果断地告

诉老板，国难当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家，决不会见利忘义的。

为此，星海失业了。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战歌》已不胫而走，飞到了年轻人和一切爱国同胞的心里。

1935年底，北京爆发了“一二九”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它像一把火种，很快燃遍了全国各地。

次年初，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学生也涌向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救亡”的吼声震撼全国。

星海和诗人塞克（陈凝秋）以及许多音乐界的朋友，随着上海爱国学生联合组织的“扩大宣传团”，昂首走在队伍里，国民党武装军队和便衣探捕都出动了。他们挥武警棍，殴打群众，还用高压水龙头喷射群众。

星海和塞克愤慨不已，塞克递给星海一首前一天写好的歌词，“请尽快谱个曲子吧，最好在游行时候能唱出去”。

星海很快浏览了一遍歌词，顿时双眼炯炯发光，如同得到了冲锋的命令，他随即拿出笔，急速记诵歌词。突然水龙头扫射过来，星海全然不顾，背向水龙头，任凭水柱的喷射，伴着游行队伍强有力的步伐酝酿着旋律。不过五、六分钟，雄壮的音乐形象顷刻从他笔端涌出。

“好了”，星海在游行的队伍中高声喊到，“我把《救国军歌》给大家背一遍。”说罢便高声唱了起来：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

有的青年见机行事，赶忙把歌词抄在没有打湿的小旗上，立刻歌声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整个游行队伍。

后来，这首《救国军歌》被歌咏队、民众歌咏会等演唱，逐渐在全国社会各阶层中唱开了。西安事变时，爱国群众还唱着它，手挽手示威游行。

1936年9月，星海跟从《壮志凌云》外景队，来到河南郑州。他东奔西走收集民歌，赶集，赶庙会，还兴致勃勃地来到黄河渡口，倾听船夫的劳动号子，领略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魅力。

星海为《壮志凌云》所谱写的表现难民为争取生存而拚命的心声——《拉犁歌》深得群众的喜爱。电影放映后，插曲不胫而走，迅速流行，在全国各地青年中广为传唱。

此时，新华影片公司老板为了赚大钱，把星海请去，先赞扬了星海一番，马上话锋一转说道：

“洗生生，敝公司全体同仁托你的福赚了一大笔钱，眼下，还有一部片子很有味，这三支插曲全拜托你了。”

星海平静地说：“只要是进步的、抗战的片子，插曲很好办。”

当星海拿过歌单一看，只见全是迎合低级趣味，像当时流行的《毛毛雨》那样的黄色歌曲，星海毫不客气地说：

“这是麻痹青年人，不是鼓励抗战的词，难道你想让我的战士唱着这种肉麻的歌曲去上战场吗？”

“我们在一起，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哼，若写这种歌，我宁肯饿肚皮。”星海镇定地说，“我永远都不会

谱这种靡靡之音。”

“如果真这样，就再也没有单位敢聘你了。”老板威胁地说。

“这你别操心，我现在就辞职。”说完，星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新华影片公司。

此后，星海分文不收，义务为一些进步的话剧如《太平天国》、《日出》等谱写了插曲，并为青年音乐爱好者讲作曲法，教指挥，为“民众歌咏会”培养歌咏干部。

这年冬天，星海经常出现在上海宝山县大场以南地区，出现在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型教育团体——山海工学团。

为教山海工学团的小娃娃指挥和排练《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等合唱歌曲，星海有时干脆住在农民家，清晨站在屋后竹林旁练习小提琴，白天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星海就这样，每天挟着一个破包奔走于工农民众之中，不知疲倦地为歌咏队指挥教唱。回到家后又伏案谱曲，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回国一年多，星海已成为了全国闻名的民众音乐家。

## 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件。8月13日，抗日的炮火在上海打响了。

8月19日，星海和上海文化戏剧界的两位同志出席了上海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救亡演剧队的集会。会后，星海参加了戏剧家洪深和金山筹建的救亡演剧二队，负责音乐工作。

当晚，星海回到家中与妈妈话别。想到马上就要离开年老体弱的母亲，不由自主地一阵酸楚，而自己30多岁了，却没能让母亲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又觉得很愧疚。当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要远别，奔赴前线时，尽管有点依依不舍，但老人深明大义，安慰星海说：“孩子，你放心的去吧，妈妈相信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次日，星海与演剧二队的洪深、金山、王莹、白鲁等十几个人，乘一小船启程了，途经苏州、南京，9月到达了开封。

一到开封，星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步行到各个学校，为同学们指挥教唱，组织歌咏队。星海每到一处，都会被成群的青年男女围着，请他签字，合影留念。星海也趁机耐心细致地宣传抗日救亡，深入浅出地讲解音乐知识，讲授作曲法，热情鼓励青年们大胆创作。

9月中旬，演剧二队到达了六朝古都——洛阳，星海依旧不辞辛劳，到洛阳四周的农村集镇，教唱抗战歌曲，他还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驻地，组织歌咏队，为官兵指挥教唱。

9月19日，在洛阳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救亡歌咏大会。国民党驻军歌咏队和军乐队也参加了演唱，当最后一曲由星海指挥国民党军乐队欢奏《救国军歌》响起时，那质朴的歌词、雄壮激昂的歌声震撼着人们的心，鼓舞着国民党官兵掉转枪口，一致对外，奔赴抗日前线，保卫神圣的中华民族。

10月3日，救亡演剧二队抵达武汉。他们立即在车上搭起简单的布景，装上扩音喇叭，做为流动舞台，在大街小巷巡回演出。

星海除参加演剧二队集体宣传外，还来到武汉的工矿学校、车站码头、



剧场茶馆为群众指挥教唱，并亲自组建了60多个歌咏团体。那时，演剧二队，只供三餐，发极少的零用钱，没有薪金，星海每天奔波于武汉三镇，常常是饿着肚子教歌、指挥。

一个雪花纷飞的寒冷日子，星海收到了母亲托人捎来的缝补好的破棉衣，睹物思人，勾起了星海对母亲的深切思念。分别4个多月，她老人家一切可好？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此时对母亲的惦念，使他坐卧不安，待伙伴们休息了，星海给母亲写了分别以来的第一封长长的信。信中除了尽吐拳拳之心外，还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他写道：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用宏亮的歌声震动被压迫民族，慰藉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一切苦难的人们。

每当我站在民众面前教他们唱歌，他们热烈地欢迎我，使我产生一种真挚的感情。我是那样热爱民众，我要为他们歌唱。

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希望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女们都勇敢地向前。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们的纯洁的爱给国家。同心合力在民族斗争中产生一个新中国。

星海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开展救亡歌咏活动，星海每天起早贪黑，顶酷暑冒严寒，坚持不懈地为学生、工人、村民指挥教唱，谱写了一曲曲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的抗战歌曲。

## 九、周恩来的关怀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宣布成立了军委会政治部，为了同国民党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担任了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星海被推举为三厅音乐科主任，与张曙同志共同主持抗战音乐运动。

由于形势的需要，救亡演剧二队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由金山、田方带队为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最后一滴血》；其它人由洪深率领继续在河南、安徽农村巡回宣传演出。星海留在武汉。

一天清晨，参加拍电影的同志正通宵达旦忙活在摄影棚里，星海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周恩来要来看望大家。

当大伙迎着晨曦回宿舍时，星海兴冲冲地大声宣布：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周恩来副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大伙以为星海为活跃气氛，闹着玩的。共产党的副主席，能到我们这个小小的二队来？大家还真不敢当真。

不一会儿，门开了，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来到了大家的面前，一一握手致意后，和大家一起随便地坐在地铺上，和蔼地问长问短，又给大家讲起当前的抗战形势、必胜的信心和如何才能致胜，最后还宣布了演出队的任务。

临走时，周恩来走到星海面前说道：“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你说‘要能吃普通人不能吃的苦’，对吗？”

“是的。”星海由衷地点头回答，他在心底里不由得惊叹周恩来的记忆力。

“在一定的条件下，吃苦是必然的，这也是取胜的必要条件，但吃苦，并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四万万大众不吃苦。”

星海像个用功的学生，无比激动地聆听并牢记住了周恩来的教诲。周恩来的关怀像长江的激流，令星海久久不能平静。更令星海激动不已的是，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不久后的一天，星海正在音乐科里谱曲，周恩来带着理发员小赵来了，还玩笑着说：“小赵同志，看看谁是你的服务对象。”

小赵往屋里巡视一遍，来到星海身边，把白围布抖开：“怪不得周恩来同志让我来呢，你的头发都可以作鸟窝了，星海同志快坐下吧。”

星海一捋头发，望着周恩来，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理发吧。”周恩来笑吟吟地说，“星海同志，工作再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生活哟。”

星海从周恩来和同志们的关怀中受到巨大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工作劲头也更大了。

面对日寇对武汉的一次次猛攻，敌机的连续不断的狂轰滥炸。星海不顾个人安危，接连举办了许许多多次歌咏音乐会、歌咏游行、火炬歌咏游行、个人作品歌咏大会，并不顾一些人的造谣中伤和故意刁难，克服重重困难，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星海认识到了少年儿童是抗战救亡强大的后备力量，为了对孩子们进行抗战教育，他为武昌学生救亡团体谱写了《祖国的孩子们》，还教少年儿童唱《只怕不抵抗》，你听：

吹起小喇叭，达底达底达！  
打起小铜鼓，得弄得弄咚！  
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  
一刀斩汉奸，一枪打东洋，  
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

孩子们唱起来多活泼、带劲啊！

1938年6月的一天晚上，冼星海刚刚回到音乐科所在地武昌郊区县华林，一个游击队打扮的小伙子急冲冲闯了进来。“我是从山西来的桂涛声，想请星海同志为太行山的战友们谱一支队歌。”

星海一边让桂涛声给大家介绍山西游击队与日寇英勇搏斗的战地实况，一边盯着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仿佛身临现场和大家一同浴血奋战，与大家一道为胜利欢呼雀跃，随即音乐形象展现眼前，星海用笔赶紧记录下了灵感：由舒展宽广明朗向上的小调主旋律，引出战斗性的进行曲旋律，既充满青春朝气，又有豪迈精壮的气势。

桂涛声的话音刚落一会儿，星海便兴奋地说：“大家听听山西抗日队歌《在太行山上》这么唱行吗？”边说边摇着手臂，打着拍子唱了起来：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

满屋的人都惊呆了，这么快就谱成了如此美的旋律！不久，这首歌在武汉“七·七”抗战纪念宣传周的歌咏大会上，一经张曙、林路首先唱出，便受到群众的喜爱，很快传遍了祖国大地。

7月初，星海又为山西来的先珂同志谱好了一曲《游击军》。歌咏队的骨干们竞相传唱。

7月6日，武汉举行了第二期抗战宣传周歌咏火炬大游行。近50万民众

高举自制的火炬，表达自己如火般的救亡热情，也为古老的黄鹤楼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辉。

在火把和探照灯照耀下，星海伸展双臂，统一指挥着几十万游行的群众唱起了《游击军》：

喊嚓喊嚓，三个五个，  
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  
我们是游击队的兄弟，

……

由弱到强，模仿战士脚步声，引出跳荡的旋律越来越响亮，仿佛置身于杀敌的战场。在滚滚的长江岸边组成的大合唱，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昂首挺胸，压倒一切的力量，更开创了音乐史上的新纪元。

不料，正当人民大众发生抗日的呐喊的时候，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代表陈诚却如坐针毡，坐卧不安。

他们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放假警报哄散群众集会，破坏抗日救亡运动。事后，陈诚还派自己的秘书谢然之来到音乐科，想以月薪 800 元音乐将官之衔来收买星海，星海愤慨地指问：“救亡有什么罪，难道想让我们当亡国奴吗？”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国民党的高薪聘请。国民党便下令合并几十个歌咏团体，借机排斥星海，而且还规定不准演唱聂耳、冼星海等作曲的救亡歌。

星海对国民党的做法，早有戒备。此前，周恩来去延安开会之前，已对星海的处境，两党合作以来的形势做了详细分析，并介绍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当时听完后，星海便说：

“我发现，现在中国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上升，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它拯救着垂亡的祖国，解放那苦难的奴隶。”

末了，星海还恳请周恩来帮助他去延安。

“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你去延安会大有作为的。”周恩来高兴地说，“党需要你们，革命没有大批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你们去延安的事，我让办事处妥善安排。”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 9 月给星海发来了沙可夫院长签字的任教聘请书，热情欢迎星海担任该院音乐系教授。

党的召唤，激励着星海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0 月初，星海和他新婚不久的爱人钱韵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乘上西去的列车，冒着敌机的轰炸，经郑州、洛阳到达西安。

11 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冼星海身着西服，装扮成华侨商人，与夫人坐上由华侨捐赠的载着医药的救护汽车，越过重重封锁，躲过层层关卡，11 月 3 日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

## 十、“鲁艺”的音乐教授

星海一踏上这片圣地，不顾旅途劳累，便顶着敌入的炮火，参观了中国革命音乐干部的培训基地——鲁迅艺术学校。第 5 天就为陕北公学青年培训班，谱写了《青训班歌》。

在延安，星海为新鲜事物所吸引，为同志们那种乐观、热情、刻苦的情绪所感染，更加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党对艺术家的关怀。他精神焕

发，干劲倍增。他把自己当做普通一兵，和大家一样住窑洞，吃小米饭，喝白菜汤。

在星海的时间安排表里，除了睡眠，就是学习，接待客人，备课，创作和教学。白天，他为音乐系同学们讲课，同鲁艺师生一道劳动，傍晚，一手提着照明马灯，一手拿一根打狼的木棍，到各个村去教歌和辅导，深夜才回家。

在课堂上，星海是大家尊敬的严师；课后他又成了同学们亲密的朋友。有时，晚上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来到星海的窑洞，探讨学习疑难，倾听星海艰难曲折的经历，星海则慷慨地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买置茶点款待大家，笑语盈盈，其乐融融。星海还常常鼓励同学们深入到人民群众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广泛向民间音乐学习，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制造乐器。

到延安后一年半时间里，星海以巨大的创作激情创作了一系列的新歌剧。

延安的秧歌剧、联唱剧等虽情节简单，形式不够完整，但其内容密切配合斗争的现实，深受群众欢迎。1938年12月，花10天时间，星海为歌剧《军民进行曲》谱完全部音乐。次年1月，在鲁艺正式公演，引起强烈反响。

1939年3月，陕甘宁地区为坚持长期抗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星海为此写了一个大型歌舞话报剧——《生产大合唱》。21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演出。这首反复咏唱的具有江南民歌风味的四句短歌，质朴凝练，像冰雪融化的一股清泉，又像越冬的树杈发出嫩芽一样清新。大合唱紧密结合现实，音乐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首次演出就获得了成功。

随即，星海又与老朋友塞克，携手创作了《秋收突击》、《三八妇女节歌》、《满洲囚徒进行曲》等。

## 十一、黄河大合唱

1939年春，大家奔走相告：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历经千难万苦，渡过黄河来到延安了。

“光未然同志来了吗？”星海急着打听

“他在突破敌人围攻中，从马背上摔下来，伤了左臂，正在边区医院疗养。”

光未然到了延安，星海恨不得插翅飞到边区医院，去看望这位老搭档，好朋友。他们相识于1936年6月上海业余歌唱队的救亡歌咏大会上，后又同政治部三厅工作，合作写了《五月的鲜花》、《赞美新中国》等歌曲。

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并谈到希望再次携手合作，为受难的民众呐喊。25岁的光未然拿出了他的长诗《黄河吟》。

“太好了。”星海边看边说，“请你把它写成合唱歌词，我要用富于民族色彩的、新的技巧来谱写，写成一部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在抗敌演剧三队一年一度的内部联欢会上，冼星海和大家一道听到了光未然充满激情朗诵改写好的《黄河吟》歌词，激动得眼里闪烁着火一样的光芒，坚定而自信地说：

“我一定要把曲子写好，我有把握写好。”

从第二天开始，星海白天开荒劳动，傍晚回到窑洞，就着一盆炭火，全然个顾春寒袭击，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边读边哼，边谱曲。他常常想起在郑州观黄河的情景，闪现出黄河那气势磅礴的画面，浮现出那些与黄河惊涛骇浪搏击的船工们。这不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斗争精神吗？不几天，便谱好了其中7首。

3月31日傍晚，演剧三从指挥老邬来到冼星海家，星海一见便说：“老邬，你来得正好，8首歌，我已谱完7首。就这首《黄河颂》怎么也谱不好，一看到‘颂’字，就想到教堂里的弥撒曲一类的音乐，一连写了七、八遍，唱起来总觉歌颂的像是上帝，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老邬建议他从民歌里改，并从挎包里掏出了一条香烟和一大包白糖：“大家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先别急，我把其它7首先带回去唱唱。”

星海拿着三队同志的慰问品，心里暖洋洋的。难为同志们想得这么周到，要知道在那艰苦的时期，这些东西可是奢侈品呢！

星海有广东人的特点，爱吃糖，尤其是动脑时。这样他一用脑，便抓一把糖放在嘴里，顷刻，乐思便如泉涌，糖水变成了黄河奔流的美妙乐句。

经过6天苦战，星海终于完成了全部乐章，又过一星期，写成了乐队伴奏的总谱。

要排练这部气势磅礴、宏伟的大型作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上哪儿去找伴奏的西洋乐器呢？

大家集思广义，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省钱省料、奇特有效的伴奏方法：用一个汽油桶安上一把木把子、两只轴子，以弹棉花的弓子那两根牛筋作弦，发出浑厚有力的低音；用吃饭的调羹放在吃饭的大搪瓷缸子里一摇，打出了流水样的声音。

大家以乐观主义精神，千方百计排除一切困难，热情洋溢地、一次又一次地认真排练。

这排练的一幕被来延安观光的美国女作曲家霍芙曼看见了。她十分惊讶，也对他们充满了敬佩，她竖起大拇指对星海说：

“了不起，中华民族真了不起，我觉得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这个巨大的、不可抵御的中华民族，正像一个猛狮发出怒吼。这吼声预告着一个新的中国将诞生，我一定要将这部作品译成英文。”

当即，她便端起相机拍摄下了排练的场面，并对两件“特殊的乐器”——装有调羹的大搪瓷缸子和汽油桶做低音胡来了个大特写。

1939年4月上旬，演剧三队在陕公礼堂公演了《黄河大合唱》，他们以其与黄河搏斗的亲身经历和饱满热情，使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延安听众的热烈称赞。

5月11日，在为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正式演出，以鲁艺师生为主的500多合唱队员，站满了整个舞台，台小人多，合唱队向两边拉开，演员和观众连成了一片。

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来了。

星海身穿灰布上装，腰束皮带，脚穿自己编的布草鞋，手握指挥棒，精神饱满地走上台。《黄河大合唱》在声情并茂的朗诵声中开始了。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结束后，毛主席兴奋地带头鼓掌，连声说“好！好！好！”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听众们也为这部大合唱的艺术魅力而感染，仿佛正置身抗日的战场，为保卫伟大的祖国而浴血奋战。

后来，毛主席单独接见星海，热情赞扬《黄河大合唱》，并送给星海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墨水，勉励星海为人民谱写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5月15日，星海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6月14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当晚星海兴奋得难以入眠，他激动地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这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我现在还有许多不足，我要在党的领导下，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奋斗！”

7月8日，在“鲁艺”为欢迎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文艺晚会上，冼星海再次亲自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周恩来一字一句地听完后，走上舞台，紧紧握住星海的手说：“星海同志，祝贺你的成功。……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合唱。”并高兴地在总谱上挥笔题词：

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此后，这惊心动魄，鼓舞人心的，划时代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带着党中央的赞许，代表着民族的呼声，响彻神州。又从神州河畔，传到了遥远的密西西比河。美国著名的普令司音乐院合唱队曾在纽约举行盛大音乐会，演出《黄河大合唱》，伦敦和莫斯科等大城市都先后演出。《黄河大合唱》登上了国际舞台，世界各国友好人士也公认这是一部有相当水平的佳作。它让全世界更深地了解了中华民族。

## 十二、长眼于莫斯科

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党中央的委托，前往苏联完成抗战新闻电影《八路军与老百姓》的作曲配音任务。

行前，毛主席在杨家岭再次接见了冼星海，并盛情款待。饭后，勉励他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用自己的音乐继续战斗。

5月14日，星海告别妻子和刚9个月的爱女妮娜，与电影艺术家袁牧之一道从延安启程。为了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和纪念母亲，星海代名为“黄训”。

几经周折，同年11月，他们到达莫斯科，住在高尔基大街“第三国际宿舍”。

星海一到达莫斯科，便抓紧每一次学习机会。他带着乐谱去莫斯科音乐院听交响乐，应邀出席苏联音乐家召开的座谈会，热情洋溢地为苏联音乐家弹奏《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由此结交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

星海住在一间配有钢琴的房间，很舒适，但他却常常怀念“鲁艺”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思念朝夕相处的师生们，也惦念妻子和爱女，想念毛泽东主席。

一天，透过窗子领略莫斯科异国情调，星海忽然觉得自己也心越重山，魂飞万里，回到了宝塔山下的延河之滨。这时，灵感来了，乐思如泉涌，他连忙找出1935年就开始琢磨构思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将新的旋律谱好，并在标题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此作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光辉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前苏联发起突然袭击，面对

侵略者肆无忌惮残杀居民，星海无比愤慨。

6月27日，共产国际代表季米特洛夫在办公厅接见了星海，并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支部宣布，为保障中国艺术家在战争期间的人身安全，准备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此后，星海创作了《神圣之战》交响乐，歌颂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把它呈献给了斯大林同志和英勇的苏联红军。

苏德大战战火越来越激烈。冼星海和袁牧之要求参战未被批准，便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眷念，提着盛放曲稿和创作札记的大枕头，准备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动身回国，但由于反动派的阻挠，他们纵能插翅也难飞，不得不停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

在乌兰巴托近1年时间（他为防国民党的暗害改名为孔宇），闲不住的星海又开始奔走指挥教唱，他为中国工人俱乐部的音乐爱好者讲乐理，教指挥，教钢琴、小提琴、黑管、三弦，帮助他们学五线谱，还为人们组织乐队，用蒙古民歌编写合奏曲，创作了管弦乐曲《牧马词》和《敕勒歌》。

1942年6月，星海被加盟共和国聘请为爱乐管弦乐团艺术指挥，他高兴地告别了乌兰巴托的朋友们，乘车前往苏联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

不幸的是，星海到达阿拉木图后，由于天气异常寒冷，食物相当匮乏，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不久，坠海便病倒了。

但星海仍以顽强的意志，不停地创作。为了创作，他不惜卖掉了呢大衣、西装和手表；为了创作，他不止一次地下乡搜集民歌。

1945年初，在苏联共产党的关怀下，冼星海被送进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诊断，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腹膜炎、心脏病、肝复水等多种疾病。

躺在病床上，星海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病痛的折磨。在每天抽出几立升腹水的情况下，仍用颤抖的手谱写出一个又一个音符，终于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完成了他的最后的创作——《中国狂想曲》，把她献给朝思暮想的祖国。

冼星海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祈盼着胜利。8月，当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喜讯之后，他激动得泪流满面，并向友人喃喃地说：“一旦我这种可怕的无力期过去，假如医生能让我站起来时，我就要埋头谱写长诗《胜利》。”然而死神不断地向星海进攻，病情不断地恶化。

10月30日晚，被病魔缠绕的星海，忽然抬动着双臂，有节奏地摆动，似乎正指挥着乐队演奏，慢慢地挥动的双手垂了下来。星海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噩耗传到延安，正值“鲁艺”将迁至沈阳。毛泽东主席拿着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沉思良久，郑重地对警卫员说：

“通知鲁艺，冼星海同志在莫斯科病逝了。按原计划推迟一天搬家，召开追悼大会！”

11月14日，鲁艺大礼堂里摆满了花圈，冼星海的巨幅画像悬挂在正中。旁边高挂着毛主席亲笔书写的挽联：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才华横溢的冼星海不幸去逝，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悲痛。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受人敬仰的人民音乐家，为了更好地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思想品德，中苏友好协会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83年元月25日，将星海的骨

灰移回中国，并在首都机场举行了迎灵仪式。这天冼星海的女儿冼尼娜悲恸欲绝地接过父亲的骨灰盒，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将一面鲜红的党旗轻轻地覆盖在它的上面，在花圈的缎带上写着：“你的歌声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此刻，首都机场悄无声息，仿佛整个大地都在为这位杰出的音乐家致哀……



